

趙景深

民國文字學稿



2 037 4813 2



天閣文子集



赵景深



湖南人民出版社



民间文学丛谈

赵景深

责任编辑：归秀文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1,000 印张：9.5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0109·1452 定价：1.25元



作者近影

新
阳古折上村庄故
事闲谈

当作场身石非定要管重新

编
徐文长

是徐文长的故事

赵某深



作者手迹

序

赵景深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的民间文艺学家。早在二十年代，他就从事这方面的著述了。几十年来，他写了不少专著和文章，在民间文学的园地里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繁忙的教务工作和从事古典戏剧、小说研究之外，继续对民间文学加以关注和研究。作为老一辈的学者，我觉得他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首先，他有一种热爱事业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积极参加民间文学领域里的各种活动，并为民间文学取得的新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个时期，他除了参加群众性的活动外，还写了不少介绍群众活动的经验和评介民间文学作品的文章。他对年轻的民间文学工作者总是抱着热心帮助的态度，不但在学校里注意培养民间文学方面的人才，而且对社会上来向他请教的业余作者，也总是耐心地帮助他们，给他们修改作品，从不感到厌烦。因此他得到了许多民间文学爱好者的尊敬。

其次，他治学上的谦虚精神和平易近人的态度，是很突出的。他不论参加群众性的演唱活动，或者参加民间文学方面的讨论会，不但认真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不厌其烦地加以记录，虚心地吸收别人好的意见。赵先生作为老一辈的学者，他不以老自居，而总以群众中普通一员的身份参加活动，并且以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乐，正如他在他自己文章中说的：“我就来做个民

间文学运动的小卒，摇旗呐喊一下吧。”

另外，他在如何跟上时代这点上显然也是作了努力的。他在自己的可能范围内，总是力图用新的观点来看待民间文学的现象，并不为在旧时代取得的一些成就而限制自己前进的步伐。这回他把自己历年来散见于报章杂志的文章结集出版，涉及的内容是比较广的，除了解放后的文章外，也收了解放前的一部分旧作和译著，这一方面藉以看出自己走过的路；另方面也着眼在向民间文学工作者提供一些资料，给在民间文学领域里继续前进的人们送上一块奠基石。他在后记里说：“如果在他们前进时，我的这一集子能给他们一些方便和帮助，那我就非常满意了。”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中，我国文艺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民间文学也不例外，我们的视野扩大了，开拓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领域。研究工作也比以前深入，除了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民间文学外，也注意到了从其他角度（例如从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等）来研究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多方面的价值正在被发掘出来。虽然这方面现在刚刚开始，但已经可以看出在不久的将来，它将会得到更多的进展。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当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同时我们也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指导下，对当前世界上某些方法加以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学问总是在前人留下的资料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因此，我认为赵先生的这个集子的出版，对今后我国民间文学的研究会有一定的意义。

我和赵先生相识在建国初期，算起来也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这期间的有些事情是我难以忘记的：记得一九五八年，我们一起去北京出席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大会时，他那时已年近花甲，

还是精神奕奕地和大家一起参加会议，他的那种不服老的精神很激励我们。就在那次会议期间，他摔了一跤，跌断了大胯骨，在医院和家里整整疗养了三个月。这之后，他还仍然尽可能地参加各种民间文学活动，并致力于培养新人的工作。一九七二年底，我因发现心脏有些毛病，在家休养，想趁这机会写一本关于民间故事的书。一着手，资料却是个问题，我家里虽然积累了一些资料，但很感不足。这时我就想起赵先生来，我决心去找他借资料。赵先生很慷慨，我要什么，他都一一检出来给我。我很感谢他对我的支持。现在，我写的《中国民间故事初探》已经与世人见面，如果那时没有赵先生的支援，这本书是写不成的。

“四人帮”被粉碎后，民间文学的活动随即就多起来，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多了。赵先生虽然比以前更显得苍老，但还是那般谦虚和善。这两年他抱病在家，很少出门了，但有时也还来参加民间文学的活动。大约去年春天，在一次会议上，赵先生向我提到他将出版一本文集，稿子已交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到确定以后，希望我给他写一篇序言。我当时虽然感到自己的学识和才力，都不足为先生作品写序，但他那种认真的神情和恳切的态度，使我推脱不得；今年上半年，在一次宴请日本友人之后，我们一同回家路上他又一次向我提出写序的事。这次，湖南人民出版社审定的稿子来了，他特地派女儿把稿子送给我，并附了一封信，信中还提到前曾两次和我谈过写序的事，可见先生做事的认真。我虽然觉得我的序言不能有助于先生的书，但感于先生的情意，就勉力写了上面这些话。

天 鹰
一九八一·十一·九

目 次

序 天鹰(1)

上卷 解放后辑存

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
学习断想	(19)
开展民间文学运动	(22)
关于《中国民间文学史》材料的引用	(27)
鲁迅先生与民间文学	(35)
鲁迅先生与民间文艺的精华和糟粕	(45)
郑振铎与童话	(53)
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	(57)
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续稿)	(60)
白蛇传故事讨论	(62)
明朝的《梁祝哀史》	(65)
敦煌歌辞《孟姜女》	(68)
关于嫦娥奔月的资料	(71)
人参传说与人参姑娘	(75)
谈聪明女婿	(80)
《徐文长的故事》序	(84)
《龙灯》序	(86)
介绍《上海民间故事选》	(92)
读《义和团的故事》	(100)

关于《义和团的故事》的断想	(109)
评介《西湖民间故事》	(113)
我看《娥并与桑洛》	(116)
民歌杂谈	(121)
上海市郊区民歌会演的经验	(126)
喜听山歌剧	(132)
谈山歌剧《采桃》	(135)
幸福地看到了《马兰花》	(138)
《鲁班的传说》	(141)
谈《秦娘美》	(144)

中卷 解放前辑存

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发端	(147)
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	(154)
民间故事专家哈特兰德逝世	(158)
小泉八云谈中国鬼	(161)
马旦氏的中国童话集	(168)
《奇谈一笑》	(171)
《蒙古民间故事》序	(175)
牛郎织女故事	(180)
牯岭祝英台山歌	(183)
中国的吉诃德先生	(189)
论帝王出身传说	(198)
中西童话的比较	(207)
说寓言	(210)
儿童图画故事论	(214)

下卷 译文附存

- 《小说的童年》选译 英国麦苟劳克原著(223)
第一章 民间故事之民俗学的解释
第二章 季子系的童话
第三章 友谊的兽的童话
第四章 兽婚的童话与国腾
童话家葛劳德传 英国海登原著(283)
后记 (287)

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文学史上，如何正确估价民间文学的地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以往，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文学史家，从固执的阶级偏见出发，在强调作家地位的同时，肆意贬低民间文学的价值，甚至把民间文学断然拒于文学的大门之外。这种做法，在今天已经受到理所当然的反对。

但是，民间文学的地位依然有待于解决，随着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两种《中国文学史》^①的问世，学术界展开了民间文学是否“正宗”与“主流”的争论，对此，想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 健康的民间文学与进步的作家文学都是人民文学的精华部分

从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同学编写的两种《中国文学史》中，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即是他们力图纠正前人轻视民间文学的错误，希望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对民间文学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成就与作用，作出正确的解释。他们都提出了下述的论断：民间文学是我国文学的主流。这个出发点应当说是好的。复旦大学

^①指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一九五五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五年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出版）。

的同学并没有因此而轻视作家文学，特别是那些在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进步作家的文学。例如在复旦大学编的文学史中对屈原和司马迁都列有专章，并且分别冠以“伟大的爱国诗人”、“伟大的散文家”的光荣称号，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是把进步的作家文学放在突出的地位的；反之，《诗经》中的民歌只用两节的篇幅论述，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只占一节，而《木兰诗》还是附在北朝民歌一节之中的。由此可见：作者实际上是把民间文学和进步的作家文学都看作正宗。而为了纠正前人的偏颇，也出于对民间文学的认识和感情，特意强调它的价值重大。但“主流”或“正宗”的提法，终究不当。因为把民间文学说成“主流”，则作家文学必然要算作“支流”，把民间文学称为“正宗”，则作家文学当然是“庶出”。因此，我的看法是：对民间文学的光辉价值固需重视，却不一定非要强调它是“正宗”或“主流”。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扬此抑彼的对立关系；相反地，倘若从这两种文学作用于社会的影响和彼此间的关系来看，倒是相辅相成的。

比较妥当的提法是：健康的民间文学与进步的作家文学，都是人民文学的精华部分。这也同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极符合。我国文学史上，运用形象思维的方式，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帮助人们认识生活、改造生活的神圣职责，是由健康的民间文学与进步的作家文学共同担负的。它们共同组成我国人民文学的精华部分。漫长的几千年中，民间文学不仅以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直接反映在苦难中战斗的人民生活，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同时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进步作家，启示他们写出了大量具有高度人民性的优秀作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无论是民间文学或者是进步的作

家文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各种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影响，其发展可能是不平衡的。在某一段时期，民间文学的成就和影响可能比较突出；而在另一阶段，也许进步作家的成绩比较显著，假如硬要搬用“主流”、“正宗”之类的观念来划框框，势必导致若干牵强附会的解释。我们当然应该看到，在一般情况下，民间文学由于出自受压迫最深的人民大众之手，斗争性确实会比作家文学更鲜明和强烈一些。而且每每在作家文学走进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死胡同，丧失其社会价值，堕落成宫廷玩物的时候，民间文学却还坚守着战斗的岗位，成为那个时代代表人民心声的最响亮的号角，履行它那神圣的职责。汉代的文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在汉代，作家文学总是把汉赋充当它的代表的。然而，就总体而言，汉赋却是谈不上什么价值的死文学，由于作家们大都甘为宫廷的文学侍从，写出的东西，大部分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或充当帝王们茶余酒后消遣品的，所以内容多脱不了对荒淫享乐的奉承，而形式上又讲究雕词镂句，重视骈俪典雅，它们脱离社会的斗争，脱离人民，粉饰太平是无庸怀疑的了。那个时代最值得推崇的文学，是乐府民歌。它们以高昂的战斗风格，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向封建制度与统治阶级开出了猛烈的排炮！例如《东门行》一类的民歌，以简练的笔触蘸和着悲愤的感情，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在那个社会里，人民仍然如同《豳风·七月》中反映的奴隶时代一样难以生存，诗中“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的凄凉景况，正是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又如《陌上桑》这首千古流传的佳作，以充沛的感情赞颂了以罗敷为代表的劳动人民身上那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质，同时却又无情地讥讽和鞭挞了那个代表统治阶级的“使君”灵魂的丑恶。此外，象《孔雀东南飞》这首脍炙人口

的叙事诗，通过刘兰芝、焦仲卿的悲剧，对封建礼教作了沉痛而愤怒的控诉。汉代文学中，民间文学的成就，可说是极其辉煌的，它不仅使作家文学在对照下黯然失色，同时也是给宫廷文学以针锋相对的沉重打击。然而，拿元代的文坛来看，虽然不能忽视民间文学的成绩，却不能不特别推崇元代杂剧作家这一时期作出的卓越贡献，因为以冷静的态度观察，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文学上影响最大、吹奏出那个时代战斗号角的，是以《窦娥冤》、《陈州粜米》、《西厢记》、《鲁斋郎》、《救风尘》、《蝴蝶梦》、《望江亭》……等一系列优秀作品为代表的元杂剧。听听《窦娥冤》中那个无辜被杀的少女在法场上对封建社会黑暗政治的控诉吧：“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富貴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这般顺水推船！天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地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抗议的呼声何等壮烈！在整个文学史上，又能找得出几篇足以与之并驾齐驱的作品来呢？当然，就元杂剧的战斗性及其在艺术上的辉煌造诣来说，与民间文学的影响以及那个时代人民群众的通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元杂剧的取材，来自水深火热的人民生活，元杂剧的演员，也多是受迫害的下层人民，元杂剧的观众便是人民大众。由于人民的支持和热爱，杂剧作家受到了巨大力量的鼓舞，才能写出如此众多而又饶有意义的作品。尽管存在这些情况，我们仍得承认它是进步作家的劳动成果，如果说它是“支流”、“庶出”而撇开它，我们能找出比它更能代表那个时代文学成就的么？

“主流”、“正宗”的提法之所以不合适，还在于上述观念在某些同志中导致一系列简单化的做法，有些同志扣住作者的阶层或阶级作为分别“正宗”和“非正宗”、“主流”与“支流”的标准，而这种区别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忽视了文学的复杂性。实

际上，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都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名词，在内容上是不可一律对待的。作家文学中，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如既有表露强烈爱国主义的《楚辞》，也有一味宣扬糜烂的享乐主义的宫体诗；既有感情真实、行文严肃的《史记》，也有铺张扬厉、追求形式的汉赋……就是同一时代同一样式的文学作品中，也不免既具精华，又有糟粕。例如明清小说中，既有歌颂农民起义为主体的《水浒传》，也有诽谤农民起义的《荡寇志》。因此，在作家文学中，应当有进步与落后甚至是反动之分。同样，民间文学也存在健康与不健康的区别。以《国风·伐檀》篇为例，作品所显示的反抗精神很是强烈，读之有如亲耳听到农奴们对奴隶主严厉的呵斥与质问；但是再看看敦煌发现的唐代《舜子至孝变文》吧，那里唱出的基调却全然相反，它鼓励人们学习那个按《论语》、《孝经》、《礼记》的信条行事的舜子，宣扬“逆来顺受”、“以德报怨”的忍让哲学，鼓吹人们在即便蒙受诬陷、屈打、虐待甚至谋杀的严酷迫害下，也要本着委曲求全的忍让精神来“感化”恶人。这样的民间文学就很成问题。当然敦煌变文也有些是写得相当好的。又如在明代山歌《挂枝儿》、《劈破玉》一类的作品里，也确实存在因统治阶级思想的侵蚀而渗透不健康的思想感情的东西。此外，也还存在部分不足以称之为精华的东西。所以，仅仅依据作者的成份来下判决，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办法。

简单化的做法，还表现在某些同志采用数字上的统计以及类似的方法，来确定民间文学的“主流”地位。比如有人提出：民间文学在数量上肯定占压倒优势，只是留存不多而使作家文学显得突出，他举《诗经》三百篇中《国风》拥有超过半数的事实为例，提出倘若不是孔子从奴隶主的立场出发删削民间文学，比例就断不止此。而传说当时有诗三千多首，想必大部是民间文学。所以

民间文学该是“主流”。有的说：作家多长篇，民间擅短制，后者更容易受欢迎。这类推断，缺乏科学根据，也不足以作为权衡的标尺。它反映出某些同志在思想方法上多少有点形式主义，他们不是依据文学对社会的作用，以及这种文学在整个文学发展中所起的影响来估量，而是扣住一些无关紧要的枝节现象，因而并不能就民间文学的地位作出正确的令人信服的阐释，甚至在效果上适得其反。即如数量说，我们知道：古代劳动人民虽然具有很高的智慧和才能，但由于他们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加上为生活所迫，终年劳累，从事文学创作的条件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的，作品的数量不一定超过文人，而数量也并不能说明民间文学的价值。因此，我们要避免这类形式主义的判决。

二 民间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上的卓越贡献

民间文学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作出的卓越的贡献，至少可以归纳为下列三点。

一、民间文学首开文学反映现实的光辉道路，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奠基者。

我国文学具有优良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是从民间文学开始的。人们一致认为：我国正式的文学是从《诗经》开始的，在列举我国文学光辉成就的时候，照例都把《诗经》列为首位。这不仅由于它是三千年文化史中第一部见之文字的文学著作，同时也是由于《诗经》中的《国风》部分，相当深刻地反映了周代社会生活，特别是从被压迫者的地位，揭露了当时严重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制度的腐朽。以长篇叙事诗《豳风·七月》为例，我们看到的，是比一般正史更为翔实可信的历史画卷，诗中不仅悲愤地记叙了奴隶们在皮鞭胁迫下酷暑寒冬无休无歇的劳累生活，同时也暴露了奴隶